

拉夫桑贾尼时期的伊朗改革述评

——兼论伊朗保守与改革力量轮替的政治钟摆效应

刘中民*

内容提要 2017年1月8日，伊朗前总统、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拉夫桑贾尼逝世。作为伊朗改革的开启者，拉夫桑贾尼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所开启的改革进程对于伊朗摆脱内政外交困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拉夫桑贾尼改革的总体特征来看，拉夫桑贾尼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在不触及伊斯兰体制的框架下，通过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局部调整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发展。尽管拉夫桑贾尼的改革并没有动摇伊朗伊斯兰体制的框架，但依然引起了传统保守派势力的强烈反对，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化。这种分化及其导致的改革与保守力量的政治轮替一直贯穿于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历史之中。2013年以来，温和保守派鲁哈尼再次开启改革，但伊朗能否走出改革与保守势力轮回的历史怪圈尚需拭目以待。

关键词 拉夫桑贾尼 伊朗改革 改革派 保守派

2017年1月8日，伊朗前总统、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拉夫桑贾尼溘然离世。作为伊朗改革的开启者，拉夫桑贾尼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所开启的改革进程对于伊朗摆脱内政外交困境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出生于1934年的拉夫桑贾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元老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开始从事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斗争，并多次被捕入狱。1979年，

*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拉夫桑贾尼先后担任伊朗革命委员会成员、内务部长等职。1980年7月,他当选为议长。1988年6月两伊战争进入关键时刻,霍梅尼任命他为武装部队代总司令,执掌三军。1989年7月,拉夫桑贾尼正式当选为伊朗总统。

在拉夫桑贾尼任职总统期间(1989~1997年),作为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黄金搭档,二者共同推动了伊朗的改革。但伴随改革派和保守派矛盾的加深,二人的矛盾也不断加深。尽管在卸任总统后仍担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拉夫桑贾尼对伊朗政治的影响显然已大不如前。本文拟对拉夫桑贾尼任职总统期间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开启的各项改革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以此为视角对后霍梅尼时期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两大政治力量轮替的政治钟摆效应进行分析。

一 霍梅尼的历史遗产与伊朗面临的困境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根据霍梅尼思想建立起来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交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从社会发展道路研究的角度看,如何对其定性和评价,可谓众说纷纭,但大体上可归结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伊斯兰主义对世俗主义的胜利,其发展模式也被归结为以复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伊斯兰模式,这种认识尤其以伊斯兰革命后理论界和舆论界的观点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发展模式兼具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征,其内容也远非宗教复古主义所能概括,这种结论主要根据对伊斯兰革命后较长时期内伊朗社会变迁进行观察和分析得出。笔者基本上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伊斯兰革命及其选择的社会发展模式,作为对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的否定,有着丰富的现代内涵和现代社会基础,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古。^①

在政治上,伊朗伊斯兰革命绝非简单的宗教复古,参加这场革命的包括宗教阶层、产业工人、城市无产者、中产阶级、商人、知识界、反对党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可参见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第九章,人民出版社,2000。

等社会力量，在推翻专制独裁的巴列维王朝这一目标上具有广泛的一致性，但在革命后伊朗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尤其是在世俗与神权的政治发展方向上，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霍梅尼关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安排是经过与反对派的殊死斗争后才得以实现的，伊朗的伊斯兰政治架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真正形成。因此，“霍梅尼时期是新建立的伊斯兰政权与国内外敌人作殊死搏斗的急剧动荡时期。在此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内外政策带有强烈的霍梅尼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基调是激进的伊斯兰化”^①。

1979年革命后，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制现代神权政体，霍梅尼的政治理念得以基本实现。这不仅是对巴列维王朝世俗化的政治发展模式之否定，同时也是对巴列维王朝君主专制统治模式的否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以来一直困扰伊朗的宗教与世俗矛盾关系得到了彻底解决。如果说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政权始终面临宗教传统及其势力挑战的话，那么霍梅尼时期的伊朗伊斯兰政权则始终面临世俗文化及其势力的挑战，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关系依然存在于伊朗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只不过是挑战者与应战者的角色因政权更替而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伊朗伊斯兰革命才在各种世俗主义力量被先后镇压后得以真正完成。在此过程中，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较量成为伊朗政治斗争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巴列维王朝相比较，巴列维国王作为世俗力量的代表对宗教势力采取了排挤压制辅以妥协利用的策略，但最终却被以宗教势力为领导、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在霍梅尼取得革命胜利后，由于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尖锐矛盾，霍梅尼对世俗主义力量进行了无情的镇压。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朗政治依然没有跳出东方专制主义的宿命，其变化仅仅是从巴列维王朝的王权专制转向了教权专制。从客观上来说，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任何革命在取得成功后，都需要依靠暴力巩固革命成果和权力根基。但是，也必须肯定的是，伊朗政治的伊斯兰化显然包含了诸多的现代主义成分，霍梅尼通过利用伊斯兰教传统的“舒拉”（协商）和“伊智提哈德”（公议）原则，实行伊斯兰民主框架下的三权分立和总统选举制度，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无疑又是探索

① 李春放：《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50页。

现代伊斯兰民主的一种尝试。因此不难发现,宗教与世俗、专制与民主的矛盾关系依然是困扰伊朗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上,霍梅尼既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反对共产主义公有制,这种理论被称为“具有社会良心的资本主义”或“伊斯兰资本主义”^①。其具体的经济思想包括:第一,承认在伊斯兰原则下合法的私有制和私人资本,但私有制和私人资本必须符合伊斯兰法,私人资本必须投资到国家轻重工业和商业中去,为国家作贡献。第二,在伊斯兰经济中,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伊斯兰不承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也不赞成消灭地主和资本家,但伊斯兰禁止囤积居奇和牟取暴利。第三,用伊斯兰教规来调节市场。伊斯兰国家是一个照顾穷人的国家,且掌握相当大的经济权力。它占有财产,对国有财产、国库收入进行组织和安排,并征收各种捐税。^②

从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来看,霍梅尼时期的伊朗经济十分不稳定,具有波动的特征,并在总体上呈现出萎缩的态势,除农业的发展较巴列维王朝有较大增长外,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石油收入在总体上都呈下降的趋势。霍梅尼推行的伊斯兰化经济政策旨在扶贫抑富、遏制贫富两极分化,但在事实上并没有改变贫富分化的状况,社会贫困也远未得到消除。^③ 伊朗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处境也更加孤立。伊朗经济发展的萎缩固然与西方的制裁以及两伊战争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但无疑也与霍梅尼时期伊朗片面推行经济伊斯兰化,忽视市场经济规律,试图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等内向、保守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观选择有重要的关系。

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霍梅尼认为,伊斯兰革命不仅要在伊朗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而且要在全世界寻求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伊斯兰世界秩序”的思想首先体现为反西方的思想,其内在的依据是伊斯兰世界正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世俗化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偏离了伊斯兰的正确道路,才导致了穆斯林社会的失败和衰落。因此,“任何企图使伊斯兰历史遗产世俗化和

① 冀开运:《论伊朗的发展战略》,《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第18页。

② 详细介绍可参见冀开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第26~27页。

③ 具体情况可参见哈全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人民出版社,2006,第343~344页。

民族化的政府都是非法的”^①。所以，要重建伊斯兰秩序，恢复真主的中心地位，必须要用伊斯兰法取代按西方模式确立的世俗法律，才能真正拯救伊斯兰和穆斯林。霍梅尼对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同样持反对态度。伊朗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体现了“不要东方”的反社会主义色彩，但在现实层面上又体现了基于国家利益考虑的灵活性，在对美苏的外交政策上体现了反美甚于反苏的特点。

在霍梅尼看来，要实现伊斯兰世界秩序，最佳的办法是首先在伊朗建立伊斯兰政府，再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将它输出到其他伊斯兰国家，最后将伊斯兰教传播到全世界。在实践上，由于“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外交政策的推行，导致伊朗不仅在海湾和中东地区四面树敌，而且在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中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伊朗奉行“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仅以宗教意识形态为出发点，拒绝东西方，企图颠覆海湾国家的政体，建立它所期望的伊斯兰政体，其本身又不具备实现这一战略的政治经济实力。因此，这一政策从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其结果是不仅导致伊朗在海湾地区四面树敌，而且在东西方之间也十分孤立。更为重要的是，推行这一政策所导致的封闭和孤立的处境，也使伊朗在经济上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并因此蒙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二 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领导体制的形成

在1989年霍梅尼去世之际，伊朗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与外交危机。当时，伊斯兰政权体制下改革派与保守派围绕内政外交的斗争与较量，构成了影响伊朗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在法基赫（宗教领袖）主导下的“宪政”体制内，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借助于霍梅尼确立的伊斯兰政权体制的合法性获取其政治权威，但在内政与外交的具体政策上却通过伊朗伊斯兰“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在总统与议会选举中进行政治角逐。

^① 转引自刘竟、安维华主编《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274页。

在霍梅尼生命的最后阶段,关于宗教领袖的继承方式问题,政府、议会与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矛盾就已经进入他的政治视野,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尚未成熟的伊斯兰政权的稳固。因此,在不涉及伊朗伊斯兰政权性质的前提下,对伊斯兰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霍梅尼去世前就已经提上了政治议程。此后,尽管拉夫桑贾尼政府和哈塔米政府都致力于推进伊朗的改革,但两者并非没有区别,前者的改革较为务实,而后的改革则更为开放。因此,学界有观点称前者为务实派,称后者为改革派,并形成了务实派、改革派与保守派对峙的局面。^①

伊朗的政治改革在霍梅尼晚年就已经开始,针对政府为增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干预能力向议会提交的多个法案被宪法监护委员会驳回,霍梅尼于1988年1月致函哈梅内伊总统,强调伊斯兰政府是真主委托给先知穆罕默德绝对权力的一部分。为了伊斯兰利益,政府有权限制一切活动。这表明霍梅尼支持经济上的国家主义和干预主义。为加强政府权威,霍梅尼于1988年2月下令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负责确定伊斯兰政权的利益,对议会和监护委员会之间存在分歧的法案进行最后审定,以制衡宪法监护委员会。该机构的成立增强了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应变能力,加快了立法和行政过程,提高了政府效率,昭示着伊斯兰共和国开始了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造。^②

霍梅尼在世时开始的另一改革是着手修改宪法。在霍梅尼的亲自主持下,伊朗于1989年4月成立了修宪委员会,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法吉赫问题,即最高领袖的继承制度及人选资格;国家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司法权力的集中化;议会中少数民族议员的选举问题;伊朗电台、电视台的集中管理问题;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权力与义务;修宪的程序;把国家议会改为伊斯兰议会。1989年6月3日霍梅尼病逝。也正是在霍梅尼去世前后的4月26日至6月15日,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了21次会议,并于7月28日经全民公决完成修宪。修改后的宪法明确规定:伊斯兰信仰、政教合一体制、教规、共和制及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不容更改。在此基础上,取消总理职位,总统直接领导内阁,行使行政权,使之有利于政府权力的

① 王林聪:《核问题对伊朗政权的影响》,载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21~122页。

② 冀开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第95页。

集中和统一；由总统领导新成立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取代“战时最高国防委员会”；精神领袖可由专家委员会推举一名宗教法学家担任，而不一定是最高宗教权威；设立“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裁决议会与宪法监督委员会在立法问题上的分歧；司法部总监领导司法权，任命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因此，新宪法使总统拥有更广泛的实权并使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在伊朗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政府逐渐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核心，宗教影响力在政治结构中相对下降，世俗政治势力相对上升。^①也正是经过修改宪法，原总统哈梅内伊被专家委员会顺利推举为宗教领袖，拉夫桑贾尼顺利当选为总统。

伊朗通过成立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和修改宪法，实现了伊朗政权从霍梅尼时代向后霍梅尼时代的顺利过渡，避免了国家政治生活因霍梅尼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得以确立，从而也为拉夫桑贾尼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 拉夫桑贾尼领导的政改改革

在政治领域，拉夫桑贾尼进行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政府构成方面，拉夫桑贾尼构建了以“务实派”人士和“保守派”的非中坚分子为主的内阁。拉夫桑贾尼一直主张专家治国，1989年伊朗“重建内阁”的23名成员中只有3名教士，其他大部分都在美欧的大学获得过较高学位；1993年的第二届内阁中只有司法部长和情报部长是教士，成员中有8人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9人是工程师。这说明拉夫桑贾尼的内阁是技术官僚型的内阁，被西方学者称之“建设内阁”，标志着伊朗政权“从伊斯兰极权主义过渡到实用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边缘化”。^②另一方面，在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以及政治民主方面，拉夫桑贾尼政府逐步减少宗教势力对国家事务及社会生活的干预；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力，放宽政府对言论、出版的控制，允许不同政党恢复

① 肖克：《伊朗的政治现代化：政教合一的什叶派神权政体模式的探索》，<https://wenku.baidu.com/view/dd4b4afe04a1b0717fd5dda2.html>。

② Anoushiravan Ehteshami, *After Khomeini: The Iran Second Republ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55.

活动。

在经济领域，拉夫桑贾尼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和私有化。霍梅尼推行经济领域的伊斯兰化，神职人员操纵国民经济，而他们的现代管理、科学文化知识十分贫乏，轻视或忽视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把精力集中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致使伊朗的经济发展一直十分困难，八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国内危机四伏。正是由于长期注重政治因素的主导性，忽视了经济建设，伊朗经济长期处于困境，亟待进行探索和调整。面对这种困境，拉夫桑贾尼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摆正位置，把经济工作作为中心任务。这也正如拉夫桑贾尼所言：“如果过去的10年是团结巩固的10年，那么，未来的10年是建设和争取经济发展的10年。”^①

为改变伊朗的经济困境，拉夫桑贾尼政府确立了经济自由化的方针，主张利用国际分工和外国资本发展民族经济，恢复国内私人资本的投资信心，调动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其具体内容包括：对工业、矿业及其他工业、非工业活动实行私有化，解除对经济活动、银行和金融业的国家管制，鼓励外国直接进入伊朗投资，举借外债，激活、扩大德黑兰股票交易所，实现股票交易现代化，在全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货币政策改革，逐步减少补贴，通过贸易自由化把贸易重新交给私有部门，放开物价管制，允许出逃的资本转移国内和专业人才回国参加建设。

为实现上述改革方案，伊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德黑兰股票交易所的开办，矿业及重工业私有化的推进，基什岛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货币政策改革的推行，促使伊朗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实现经济改革的目标，拉夫桑贾尼政府还推行了经济五年计划，其中第一个五年计划为1989年3月~1994年3月。该计划优先发展石油、天然气工业、石化工业；优先发展能源工业、电力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优先增加粮食产量，实现农田灌溉机械化，大力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强调初级工业和中间工业。这是一个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体现了拉夫桑贾尼政府旨在增加资本投资，鼓励私人资本参加国家重建的经济改革政策。从1995年开始，伊朗开始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其主要内容仍然

① 王凤：《两伊战争后伊朗内外政策调整述评》，《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是继续推进私有化，继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推行银行的私有化、商业化、国际化改革。伊朗经济建设中属于伊斯兰的空想的守旧的东西日益减少，相反越来越多地借鉴国际上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经验，采用合理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做法，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最终实现产业多元化。总之，与伊斯兰革命头十年的经济实践相比，伊朗经济发展呈现出私有化 - 市场化 - 出口型特征，并试图借此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多元化。

伊朗的经济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使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是，由于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该计划的推行遭遇了许多困难。第一，海湾战争后国际油价下滑，导致伊朗石油收入下降，建设资金出现短缺。第二，货币贬值、关税下降影响了伊朗国内工业，导致企业家纷纷抗议，物价上涨和失业率上升导致民众不满。第三，自由贸易区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伊朗设立自由贸易区意在吸引外商投资生产活动，鼓励技术转让，通过出口增加收入。而自由贸易区利用优惠政策进口非基本消费品，危害了民族工业。第四，伊朗接受的世界银行贷款和外国借款在 1992 年面临还债高峰期，使伊朗经济雪上加霜。第五，1990 年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大量邻国难民的涌入，伊朗官僚机构膨胀（政府官员从 1977 ~ 1978 年度的 80 万人增加到 1992 ~ 1993 年度的 200 万人），也都给伊朗经济造成了沉重压力。

四 拉夫桑贾尼领导的外交调整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下降，国家利益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实践证明，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交方针和路线，是一条把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虽然具有一定反帝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最终造成伊朗空前孤立，损害了自身利益。在地区形势变化方面，海湾战争使伊朗宿敌伊拉克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沉重打击，经济军事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与此同时，美国军事力量进入海湾地区，与伊朗的地区战略发生冲突，美国对伊朗和伊拉克采取“双重遏制”战略。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伊朗的外交政策已不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其外交政策的调整已成必然。

在外交政策的总体方面, 尽管伊朗并没有放弃“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口号, 但在实践上却呈现出逐步降温的趋势。伊朗领导人认识到, 海湾战争结束后, “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政治口号已不能促使伊朗外交目标的实现, 因此必须改善与海湾邻国的关系。拉夫桑贾尼指出, 伊朗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是“尊重(他国)领土完整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社会和宗教价值”, “我们不想成为警察, 伊朗既不会羞辱他的邻国, 也不会使他们感到有威胁, 我们应当全体合作来建设我们这个地区, 波斯湾地区应该成为像家园一样的地区, 像一个共同的农场”^①。这意味着伊朗将遵守普遍公认的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 其结果是伊朗必然要逐步降低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调门。

第一, 伊朗外交政策走向务实与开放, 并集中体现在对海湾和整个中东地区外交政策的调整, 尤其是与海湾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首先, 伊朗与伊拉克改善了关系。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全面恶化了两伊关系。1988年, 两伊战争结束, 但战争状态并没有完结, 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 两国间的许多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于伊朗政策的变化, 两伊关系得到了突破性的改善, 1990年, 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此后, 由于在国际上两伊的处境相似, 共同面临美国的威胁与制裁, 两国的矛盾有所缓解。此外, 伊朗与沙特也实现了和解。沙特是海湾六国的核心, 也是海湾地区的一个大国, 两国因1987年朝圣流血事件而于1988年中断了外交关系。自1990年10月1日伊沙两国外长在纽约会晤以后, 两国于1991年3月26日恢复了外交关系。伊朗与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的关系也得以改善。在1990年海湾危机中, 伊朗虽坚持中立立场, 但对科威特深表同情。在海湾战争期间, 伊朗政府一直与科威特流亡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海湾战争结束后, 科威特积极回报伊朗, 主张在海湾地区安全体系安排中不应该孤立伊朗, 这一原则立场对两国恢复关系起到积极作用。1991年12月伊朗外长访问了卡塔尔、阿曼、巴林和阿联酋, 与这几个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二, 伊朗务实外交的另一重要体现是与西方的整体关系得到相对缓和与改善, 但与美国的关系依然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

^① 刘月琴:《冷战后海湾地区国际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第206页。

众所周知，“拉什迪事件”是造成伊朗同西方改善关系的主要障碍。1989年，霍梅尼指控英国籍作家拉什迪所著的《撒旦诗篇》是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并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将拉什迪及该书的出版商处死。拉什迪事件严重恶化了伊朗与西方尤其是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英伊首先断交，荷兰外长取消访伊计划，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先后召回驻伊朗的使节，伊朗也召回驻欧洲共同体的使节，取消了住房部长访问联邦德国的计划。1989年霍梅尼去世时，伊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仍比较强硬。海湾战争后，美国计划联合欧洲一起对伊朗实施“遏制”战略。显然这对伊朗极其不利。为挫败美国的企图，开拓外交领域，也为了把经济改革稳步向前推进，伊朗在“拉什迪问题”上的立场逐渐松动。1995年，伊朗明确表示，将尊重西方的原则和价值观，不再派杀手刺杀拉什迪。1996年初，在经过国内激烈的政治磋商后，拉夫桑贾尼总统公开宣布，撤销杀死拉什迪的命令，从而主动排除了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障碍。伊朗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也日趋密切。从1989年至1993年，西方国家（主要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及日本在伊朗的进出口总额中每年都占40%左右。其中，德国和日本分别是伊朗最大的工业制成品进口国和石油输出国。1993年，德国在伊朗的进口总值中占17.5%，日本在出口总值中占14.8%，均位居前列。^①

在老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由于美国对伊朗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指责伊朗推行国家恐怖主义、侵犯人权、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传播宗教激进主义，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依然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与美国仍有一定的贸易往来，包括赔偿美国石油公司在伊斯兰革命期间遭受的损失、同美国两家公司签订石油购销合同等。克林顿上台后执行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政策，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石油供应和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1995年，美国政府下令禁止美国公司与伊朗签订进行石油开采合作的合同，同时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制裁，中止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和投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达马托法案》，对在伊朗进行巨额投资（4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公司实行制裁。针对美国对伊朗政策，伊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1996年伊

① 王凤：《两伊战争后伊朗内外政策调整述评》，《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朗议会通过拨款 2000 万美元的议案, 以应对美国众议院拨款 2000 万美元用于支持伊朗反政府势力的法案; 伊朗强烈谴责《达马托法案》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 并通过积极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发展与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经贸往来, 减轻美国经济制裁的压力。

五 对拉夫桑贾尼改革的历史评价

从拉夫桑贾尼改革的总体特征来看, 在不触及伊斯兰体制的框架下, 通过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局部调整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发展, 构成了拉夫桑贾尼改革的主要特点。在政治改革方面, 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总统实权的增强, 并没有改变伊朗国家体制的伊斯兰神权性质, 国家领袖仍是伊朗民众的精神支柱, 伊斯兰意识形态仍旧是国家的指导思想, 但在具体运作中吸取了一些新精神和新因素, 表现出温和、务实的倾向。在经济改革方面, 私有化和对外开放基本上也没有超出伊朗伊斯兰经济制度的范畴, 因为 1979 年伊朗宪法就规定应当实行国有、公私合作经营和私营三种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霍梅尼时期的国有化措施, 主要源于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政治需要。拉夫桑贾尼推行的私有化措施与对外开放均符合伊朗宪法的精神和承认私有制的伊斯兰经济思想。在外交调整方面, 伊朗在执行睦邻友好和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同时, 并没有放弃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长远目标, 如伊朗对中亚伊斯兰国家以及对阿富汗、巴基斯坦积极施加影响; 在中东和平问题上, 继续坚持拒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反对由美国推行的中东和平进程等激进主张。但是, 与过去相比较, 伊朗更强调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树立伊斯兰典范来扩大影响, 更注重以经济、文化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和平方式参与世界事务。

尽管拉夫桑贾尼的改革并没有动摇伊朗伊斯兰体制的框架, 但依然引起了传统保守派势力的强烈反对, 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伊朗政坛中务实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化。以拉夫桑贾尼为代表的务实派势力占据了伊朗政坛的主导地位, 主张在伊斯兰体制内对伊朗的内政外交进行改革与调整, 其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的中上层力量。而在 1992 年第四届议会选举中败北的原议长卡鲁比等一批激进派议员, 自称代表伊朗广大贫困阶层利益。在经济上, 他们主张国有化, 制定保护工人福利的劳工法, 要求优先解决群

众住房、医疗和教育问题；在政治上，反对向“自由分子”开放民主，坚决镇压政治反对派；在外交上，坚持输出革命，捍卫国家独立，不依附帝国主义，依靠自力更生，反对借债，主张同欧洲和日本等“无侵略企图”的国家建立联系，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① 在1992年的议会选举中，相对以往三届议会选举，尽管务实派的力量有所增强，尤其是代表保守派势力的教士阶层的人数大为减少，但教士阶层依然掌握着对议会的控制权，并通过议会对政府进行掣肘。

在1996年第五届议会选举前夕，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表面化。来自政府部门的多位官员联合发表声明，强调发展经济和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性，对议会掣肘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呼吁群众将务实的技术专家选进新一届议会。而保守派议员则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上述声明，强调伊朗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伊斯兰革命原则和价值为代价，主张实现社会公正，呼吁民众在选举中应支持坚持革命原则、拥护神权统治的人士。1996年议会选举后，务实派与保守派的分裂进一步加剧，拉夫桑贾尼改革遇到的阻力增加，传统保守派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机构对改革计划百般阻挠。对于拉夫桑贾尼提出的“二五”计划和财政预算，议会都迟迟不予批准。为换取改革的继续，减少保守派对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批判，拉夫桑贾尼被迫撤换副总统兼规划和预算组织的主任罗哈尼·赞贾尼，并从此放慢了改革步伐，向保守派妥协。

伊朗的政治分化不仅体现为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保守派与务实改革派的分裂，而且也体现在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与总统拉夫桑贾尼关系的微妙变化。在霍梅尼去世后不久，拉夫桑贾尼帮助哈梅内伊快速接替霍梅尼的领袖位置，哈梅内伊则支持拉夫桑贾尼参选总统，以及同步进行大大强化总统权力的宪政改革，因此他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根据宗教领袖与总统的职责划分，拉夫桑贾尼负责经济重建和外交事务，哈梅内伊负责指导道义和精神问题。哈梅内伊作为伊朗最高领袖，对于减少保守派的反对，支持拉夫桑贾尼的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拉夫桑贾尼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发展自己的势力，重用大多是受过西方教育、务实、温和的世俗知识分子，从而直接威胁到宗教领袖的地位和极端

① 冀开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第99~100页。

保守派的利益,并对伊斯兰政权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导致两人的关系开始表现出竞争性的一面。1992年,时任伊斯兰文化指导部长的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被迫辞职,这预示着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竞争关系的公开化。况且,哈梅内伊作为宗教领袖需要得到更多的宗教认可,而传统保守派则是这种认可的重要来源。此外,拉夫桑贾尼寻求西方贷款和私人投资的改革、开明的人事任用以及赋予妇女更多权利等,也将传统保守派赶到了最高领袖身边。因此,尽管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的关系尚未出现尖锐对立,但两者关系的微妙变化表明宗教领袖的立场和态度将在保守派与务实派斗争的天平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或许也正是保守派(2005年内贾德当选为伊朗总统)能够在伊朗卷土重来的体制性原因之一。

余论:伊朗能否走出改革与保守力量轮替的历史怪圈

1997年5月23日,在伊朗第七届总统大选中,务实派候选人、开明宗教人士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赢得了69.6%的选票,以绝对优势击败得到多数高层宗教人士支持的保守派候选人、时任伊朗议长的纳泰格·努里,当选为伊朗总统。在2001年的总统选举中,哈塔米竞选总统连任取得成功。在哈塔米执政的八年间,对内推行经济与民主改革,对外通过推进“文明对话”缓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伊朗内政外交政策的核心。但是,哈塔米的改革同样遭遇了来自保守派势力的严重阻挠,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对抗更加尖锐化、公开化。

哈塔米在政治上主张遵守伊斯兰宪法和法律,以法治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实行政治多元化,允许政党自由活动,不同政治观点可以争论,反对一言堂和唯我独尊;主张发展伊斯兰文化和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放宽对民主、自由的限制,营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保障人民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基本权利;主张切实提高妇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关心青少年问题,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发展繁荣服务。^①哈塔米的政治思想来源于他对伊斯兰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及融合,他在

① 伍书湖:《哈塔米改革的成就与困难》,载赵国忠、温伯友、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1998~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76页。

任何时候都不否认伊斯兰在伊朗文化和社会乃至政治机构中的中心地位，但他强调应把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和做法与个人的权利、自由和西方法治国家及公民社会的观念结合起来，以应对伊朗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科学、经济和政治的挑战。^①

为实现上述政治改革目标，哈塔米采取的政治措施主要包括：^② 第一，建立年富力强、以专家为主的内阁；第二，塑造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第三，推进社会民主改革，实行法治，进一步放松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在哈塔米执政的第一任期，其政治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尤其是政治开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经济上，坚持宪法规定的国有、合作和私营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对非战略性的经济部门实行私有化，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出口多元化，构成了哈塔米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

在外交上，哈塔米提出不同文明应该相互对话，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思想。他认为不同文明间对话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类的普遍正义和自由。文明间对话可以加深各国之间的了解，增加世界范围内的和谐，减少国际冲突，防止单一文化统治，创造包括一切文明在内的世界新文明。在这一对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哈塔米政府在改善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推进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缓和与发展、改善与欧盟关系、松动与美国的对抗僵局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哈塔米对内改革、对外缓和的治国方略始终都面临着来自保守派的强烈阻挠，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进一步分化以及双方日趋尖锐的政治对抗，以及作为保守派与改革派平衡者——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政治取向的日趋保守化，都使哈塔米的改革步履维艰，以致哈塔米在第二任期开始不久无奈承认“伊朗民主改革已经失败”。^③

哈塔米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伊朗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在宗教领袖居于主导地位的伊朗伊斯兰宪政体制下，哈塔米代表的改革派尽管通过总统选举掌握了政府，但保守派势力依然控制着宪法监护

① 范鸿达：《伊朗外交：宗教领袖与总统的作用》，《西亚非洲》2002年第5期，第32页。

② 详见伍书湖《哈塔米改革的成就与困难》，载赵国忠、温伯友、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1998～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77～78页。

③ 《哈塔米无奈承认：伊朗民主改革已经失败》，http://www.yewb.com/gb/content/2004-12/08/content_809025.htm。

委员会、专家会议、议会、军警和司法部门，并以此制约总统权力。这一政治僵局在拉夫桑贾尼执政的后期已经形成，而哈塔米更为激进的改革也必然招致保守派更为强烈的反对。

保守派与改革派政治对抗的加剧，使哈塔米改革在第二任期内遭遇了更为强大的阻力。保守派控制着最高决策机构，因此在与改革派的斗争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由于保守派的阻挠，哈塔米的改革方案很难实施，改革派政府不能兑现其竞选诺言，使其在广大民众中的信誉和威望严重受损。此外，广大民众对落后的经济发展、封闭的社会环境和不断下降的实际生活水平等现状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这一切都导致“改革派的力量正受到削弱”，并“将改革派逼至墙角”。^①

2005年6月24日，年仅49岁的保守派候选人、少壮派政治家艾哈迈迪·内贾德脱颖而出，以高达61.7%的得票率击败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当选为伊朗第9届总统。内贾德的胜选标志着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的失败与保守派势力的全面回归。至此，保守派势力控制了行政、立法、司法和军警等主要的国家权力机构。

伊朗政治重归保守，除保守派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司法机关、军警部队、情报部门等机构向总统发难这一重要原因外，作为宗教领袖的哈梅内伊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玩弄平衡权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的重要特征。哈梅内伊主要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来协调国内各派，实现国家权力的再分配。1992年，他为防止伊斯兰激进势力——伊斯兰左派（Islamic Left）坐大威胁领袖权威，利用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人事筛选制度，取消了大批该派候选人的参选资格，使得伊斯兰左派在1992年的第四届议会选举中遭到惨败，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1996年，为阻止传统保守派获取议会和总统选举的双重胜利，哈梅内伊将该派许多候选人拒之于议会选举门外。2004年，伊朗改革派的8年执政，使得国内人心思变，保守派日薄西山之势越来越明显，为保持党派平衡，防止改革的步伐走得太快，哈梅内伊再次利用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特权限制改革派参选，而使保守派赢得第七届议会选举的胜利，并使保守派人士内贾德2005年顺利当选伊

① 刘强：《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一种全球多视角的解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193～195页。

朗总统。

从内贾德执政以来的内政外交政策来看，较之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伊朗的内政与外交已发生了明显的保守化。在政治主张上，内贾德主张坚持“维护伊斯兰价值观”，切实维护国家法律和宗教习俗的尊严。在实践方面，内贾德政府反对政治自由化和多元化，坚决维护和执行伊斯兰教法，对内推行严格的宗教法令和社会管制。在经济上，内贾德强调国家资源不应当过分集中在政府手中，应当交给人民用于推动国家发展。他认为，目前伊朗对私有化的理解不全面，私有化并不意味着要出售国家财富。他还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公正问题应当是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①

从哈塔米时期缓和与对话外交向强硬外交的转向构成了伊朗政治保守化最突出的表现，有学者将这种变化称之为“伊朗革命主义外交”，其主要表现是：首先，伊朗试图从法理上冲破核不扩散机制；其次，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要求建立没有以色列的中东；最后，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②

内贾德的强硬外交对于增强伊朗的民族凝聚力，转移国内政治危机，增强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提高伊朗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伊朗与美国的严重对立、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制裁，使伊朗在国际社会日趋孤立，同时也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一方面通过制裁向伊朗施压，另一方面多次扬言通过“先发打击”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并促成其国内的政权更迭。尽管美国因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陷中东，并为伊朗的崛起排除了东西两线的地缘政治敌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从战略态势上看，伊朗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较量并未给伊朗带来实际好处。伊朗与整个国际社会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使其自身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经济制裁使伊朗无法获得自身发展急需的资金和技术。伊朗的强硬姿态虽然可以调动反抗西方强权的民族情绪，暂时转移国内矛盾视线，但未能给伊朗

① 《人物介绍：伊朗总统艾哈迈迪 - 内贾德》，<http://news.sohu.com/20090619/n264620766.shtml>。

② 参见田文林《伊朗革命主义外交——理解第三世界政治的一种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1期，第8页。

创造一个宽松而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最终损害伊朗的国家利益”。^①

在内贾德执政时期，伊朗内政外交保守化导致的困境使政治钟摆在 2013 年再次向改革的方向回摆。被称为“温和保守派”的鲁哈尼当选总统后，对内主张进行谨慎的政治经济改革，提高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对外力图通过改善美伊关系、解决伊朗核问题展示不同于内贾德的战略思维，改变伊朗日趋孤立的国际环境，改善长期遭受西方和国际社会经济制裁而不断恶化的国内经济。从目前来看，伊朗政治与外交再度呈现出温和务实的发展趋势。

但是，自霍梅尼 1989 年去世后，伊朗的内外政策一直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摇摆和轮回，同时也必将对未来伊朗的发展道路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在拉夫桑贾尼（1989 ~ 1997 年执政）和哈塔米（1997 ~ 2005 年执政）任职伊朗总统期间，是改革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艾哈迈德·内贾德执政时期（2005 ~ 2013 年）保守派执掌伊朗政权，伊朗内政外交走向保守；2013 年以来，温和保守派鲁哈尼再次开启改革。但伊朗能否走出改革与保守势力轮回的历史怪圈尚需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张向荣]

① 王林聪：《核问题对伊朗政权的影响》，载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7 ~ 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 123 ~ 124 页。

Pingnan, Fujian is about 4000 characters, which is written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Lin Deng, founder of Xiapu Manichaeism. There are two versions namely the Qing Dynasty version and the 1980's version. The content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but the new one has 10 more lines of text. *Xingfuzu Qingdan Ke*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in Xiapu, second only to text *Moniguangfo*. It was written by Lin's ancestor and Manichaeism leader, Lin Deng, to celebrate the birth of the dead. It was generally form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or the Yuan Dynasty. Like *Moniguangfo*, it is also the ancestor of many Manichaeism culture offerings in Xiapu, and its content is between the Buddhist culture and the Taoist culture. It can be cal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two Song dynasties. The living fossils of Manichaeism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nichaeism in the world.

Keywords: Xiapu Manichaeism; *Xingfuzu Qingdan Ke*; Lin Deng; Buddhism; Taoism

Review of Reform in Iran during the Rafsanjani Period—Also on the Political Pendulum Effect of the Rotation of Conservative and Reformist Forces in Iran

Liu Zhongmin

Abstract: Iran's former President, Chairman of Iranian Expediency Discernment Council Rafsanjani died on January 8, 2017. As the pioneer of Iran's reform, Rafsanjani left a deep imprint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ost-Khomeini Iran. The reform process he launched has exerted far-reaching influence for Iran to get rid of plights of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ffairs. Viewing from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Rafsanjani's reform, without changing the Islamic framework, it makes Iran's national interest,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ssible through partly adjustment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areas, which is the main feature of Rafsanjani's reform. Although Rafsanjani's reform has not shak-

en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Iran's Islamic system, it aroused strong opposition from domestic conservative forces, and produced politic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reformers and conservatives in Iran's political forces to some extent. Such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rotation the differentiation has led to, has been existed throughout post-Khomeini Iranian history. Since 2013, Rohani from moderately conservative once again launched reform. However, whether Iran could get out of the rotation between reformers and conservatives is uncertain.

Keywords: Rafsanjani; Iran Reform; Reformers; Conservatives

Global Strategic Pattern and Its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Take the Middle East as an Example

Wu Yan

Abstract: “A period of major change that's rarely seen in a century” is form from the combin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four major changes, namely, from 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y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multi-center system of world civil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ld War era to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arrival of the post post-Cold War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multi-polar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old War trend.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new imperialist” grand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global strategic pattern is facing a variety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ccording to their influence, these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categories such as undermining the unity of sovereignty, national interests facing the threat of force, security risk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land-sea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rights disputes, etc. , and the Afghan issue, us-Iran confrontation, Syrian chaos and Palestine-Israel dispute are respectively taken as representative cas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additi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in the “post post-Cold War era”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cluding terrorism,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information and cyber security challenges, resource security threats, new nationalism and deglobalization